

Academic Monographs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第二辑)

斯皮瓦克的 女性主义研究

李平/著

On Spivak's Feminist Studie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研究 / 李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第二辑)
ISBN 978-7-300-10879-7

- I. 斯…
- II. 李…
- III. 斯皮瓦克, G. G.-女性主义-研究
- IV. B712.59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493 号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第二辑)

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研究

李 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献拓方数字印刷中心		
规 格	140 mm×202 mm	32 开 本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6.5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2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杨恒达

本书是在其作者李平女士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能为她的书作序，这是件很高兴的事。我衷心希望，此书的出版将成为她学术生涯的新起点，成为很多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中的第一部。

李平女士选择斯皮瓦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有她的道理。斯皮瓦克是印度裔美国学者，她在当代理论界颇有影响。她在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方面的理论建树，使她成为不少中国青年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心中的学术明星。据我所知，不久前，在北京就有好几篇博士论文是专门研究斯皮瓦克的。李平女士对斯皮瓦克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她像斯皮瓦克一样，也是一名高校女教师，也心系第三世界，也不仅因为她像许多青年学者一样，对近些年来学术界的新思潮、新理论有浓厚兴趣，更在于她有志于向学术难题挑战，希望通过对集中了全球化过程中不少理论热点和学术热点的斯皮瓦克学术思想的研究，实现综合性学术水平的飞跃。

李平女士在对斯皮瓦克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中，能深入发掘其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抓住其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些特点，合乎逻辑地勾勒出斯皮瓦克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翻译理论、文学理论、教育思想、伦理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同她基本的女性主义思想整体结构的内在联系。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理论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理论，但是反本质主义理论难以摆脱虚无主义的困境，从而使解构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所做的努力化作虚无，使其在学术上的深邃蜕变为游戏的浅薄。斯皮瓦克的策略本质主义恰好可以避免这种由深邃变为浅薄的可笑可悲的局面，这不仅是解决当代女性主义分裂倾向的有效方法，而且在更深层面上，为解构主义提供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斯皮瓦克以其跨文化的、后现代的思维方式优势，使西方的形而上学思辨传统在自我挑战的过程中，通过和东方智慧的结合而更能自圆其说，也使她的女性主义思想不同于一般女性主义思潮而更具有深刻的理论色彩。

西方思想家构建的理论，往往主要依据西方的现实和实践，由于思想家自身人生经验和生活体验的局限而无法对东方或第三世界的一些现实难题作出精确的理论概括。例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家身处发达社会，很难体会贫困国家妇女所承担的责任对其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她们争取解放的道路之艰难，往往避而不谈妇女整体解放的问题，仅仅纠缠于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一些苦恼和忧怨，和世界上广大妇女的现实解放问题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斯皮瓦克虽然身处发达社会，但是深切关注她的第一故乡印度，尤其关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亟需人们关注的印度妇女。斯皮瓦克的个人经历使她能一方面钻研发达社会的理论精华，另一方面将这些理论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使之更具有广泛的价值和意义。

斯皮瓦克从关心印度“属下”妇女出发，进一步关心第三世界妇女和发达国家妇女的沟通问题，关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斯皮瓦克非常重视翻译问题，把翻译看作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之间沟通的桥梁。翻译通常被认为只是语言转换的实践，似乎与文化政治无关，也与第三世界妇女解放的问题无直接关联。但是，解构主义理论对语言和翻译问题的关心，也使斯皮瓦克深刻领悟到看似公正的语言转换其实同样包含着出于政治立场局限而形成的文化误读，由此而形成的翻译的政治不可忽视。对翻译的政治的忽视实际上已经造成了语言沟通、文化沟通、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严重问题。第一世界女性从她们的视角出发，想当然

地认为她们关心的问题便是普适性的问题，因而在文本翻译的选择上和翻译实践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其实，翻译的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可避免的应该是对翻译的政治的忽视，比较可怕的是在翻译中不尊重源文本所承载的文化特殊性，大量使用翻译的暴力，却仍然认为是公正态度的体现。在这种心态和态度之下，要实现真正的沟通是很困难的。所以，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的强调，并不是要突出翻译的政治，使沟通变得更加困难，而是指出了一个问题的必然性，从而便于更有针对性地寻找对策。这本身应该说也是一种政治，但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因而她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去政治化。斯皮瓦克自己以她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向我们提出了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实现沟通和理解，尤其在妇女之间实现沟通和理解的重要问题。

在探讨现代社会沟通和理解问题的时候，斯皮瓦克十分重视教育所起的作用。在她看来，不仅要摆脱属下处境的印度女性需要接受教育，而且第一世界女性也需要接受教育，通过教育而向属下女性学习，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偏见，真正做到尊重他者，尤其是尊重作为他者的第三世界妇女的伦理独特性，从而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伦理观。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斯皮瓦克认为，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尤其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会更有利于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特点在教育中对于多视角地看待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是大有好处的。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的前提下，人们正在达成共识，认为把一种文化看作具有唯一的普世价值，可以用来取代另一种文化的任何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以比较的眼光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斯皮瓦克宣告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死亡，绝不是认为比较文学已经走入了穷途末日，而是恰恰相反，把比较文学提升到一种超越学科界限、超越地区研究界限的学术研究的地位上，从而使比较文学的学生成为具有多元文化积累的跨学科人才，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间沟通和理解奠定人才的基础。由于斯皮瓦克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所以对她的女性主义

思想的研究也比对一般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具有更大、更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李平女士对斯皮瓦克的研究相当明确地指出了斯皮瓦克女性主义思想的上述特点。经过她的理论梳理和分析、阐释，斯皮瓦克女性主义思想的基本脉络相当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现在学术界对斯皮瓦克的关注已经集中在她的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也发表了不少有一定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像李平女士这样，以斯皮瓦克对印度属下女性的关怀作为切入点，对其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质和背景作出颇有见地的综合分析研究的尚不多见。李平女士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一、重点突出。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也许是所有斯皮瓦克研究者的共同话题，但是如果不能抓住她对印度属下女性的关注，实际上就是没有抓住斯皮瓦克女性主义思想的关键，从而难以分辨斯皮瓦克女性主义同西方女性主义的真正区别。李平女士的研究通过斯皮瓦克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引出了对其女性主义独特性的分析。突出了这个重点，也就可以让读者清晰看到斯皮瓦克对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二、脉络清晰。斯皮瓦克的思想观点体现出她的多重身份。机械论式的研究往往只是集中在她的一重或两重身份上，忽视了她的其他身份，因而偏向于孤立地看待她的有些思想，对于她的女性主义也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李平女士比较注意全面地看待斯皮瓦克的多重身份，她让我们看到，斯皮瓦克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一位印度裔美国妇女、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一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一位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是如何把这些身份结合到她的女性主义思想中去的。李平女士通过避免机械论式的方法而勾勒出的斯皮瓦克女性主义思想的脉络清晰，相当充分地展示出斯皮瓦克思想的深邃之处和丰富性。

三、视角新颖。斯皮瓦克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相当前卫的思想倾向，反映出西方批判思维的特点，她总是在视角上不断更新，保持学术的创新。要把握斯皮瓦克的学术创新，必须充分了解西方当代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密切跟踪最新的学术动态，才能有新颖的

视角去适应斯皮瓦克的活跃思维。李平女士的研究可以说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因而它能突破对斯皮瓦克观点的一般性理解而达到更高的高度。例如，李平女士在探讨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的讨论时，就没有局限于对其观点的泛泛理解，把斯皮瓦克指出翻译必然具有政治倾向性这一客观事实，当作斯皮瓦克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而是把西方学术界和斯皮瓦克本人所要求的学术去政治化和她的翻译理论联系起来，从而肯定了斯皮瓦克思想观点的基本逻辑。另外，关于比较文学的探讨，李平女士的研究也较好地回答了斯皮瓦克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为何宣告这个学科死亡的问题，把斯皮瓦克对比较文学的关注同她的世界眼光和女性主义观点联系起来了。

总之，本书作为李平女士学术上的新开端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我仍然希望李平女士能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再接再厉，做出更进一步的开拓。

2009年5月于波士顿

前　　言

印度裔美国评论家、教育家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理论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影响深远。作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她掌握了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理论话语，冲锋在女性主义阵地的最前沿，为广大的“属下”女性争夺话语权而战。本书将系统研究、综合阐述、深入评析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理论。

人们普遍认为，斯皮瓦克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于她以解构主义为立论基础，提出了策略本质主义，使后现代女性主义走出了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的结合使后现代女性主义陷入了困境。后现代理论对同一性的一味消解威胁到女性主义事业的基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可能性受到了某种质疑。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内部也出现了众声喧哗、互相指责的现象。为了维护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团结，并继承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性，斯皮瓦克以解构主义为基础提出了策略本质主义，呼吁在争取政治利益时不同的女性群体要团结一致，同时在女性集体内部要尊重彼此的差异。策略本质主义使后现代女性主义免于分裂，走出了困境。

斯皮瓦克深受法国学者伊利格瑞和德里达的影响，她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沿着解构主义思想来阐发的。她非常赞赏法国女性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特色，认可并推崇其反对性别歧视、弘扬女性主义的立场，但是她也看到了其不彻底之处，主要是不考虑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把西方女性的经历强加于所有女性的普遍化倾向。从后殖

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斯皮瓦克对法国女性主义者漠视种族、阶级、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批判。

对于英美女性主义关于重读经典、重写文学史的主张，斯皮瓦克也是既赞赏又批评。她以《简·爱》为例说明英美女性主义貌似与法国女性主义相异，但实质上并无多大不同，二者都忽视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非西方的女性。在批评西方两派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斯皮瓦克把研究的重心从“女性”转向“性别化的属下”，即属下女性。

斯皮瓦克从两个方面阐述属下女性的属下特征。首先，她抓住属下女性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话语权问题。在她看来，属下具有不可纠正的异质性，因而不可能在西方的话语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她们无法代表自己说话，无法进入抵抗结构，因此也不可能被他人代表，因为所有的“代表”都是“再现”，而对她们的再现无一例外都充斥着西方的认知暴力。属下的这种异质性也凸显出西方理论话语的局限性。

斯皮瓦克批评福柯、德勒兹等激进知识分子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世界形势，以为工人阶级能够具备发言的能力，无须知识分子做他们的代表。在斯皮瓦克看来，在欧洲之外的许多地方，属下根本不可能自己发言。这一点与西方的情况并不一样，不能把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斯皮瓦克指出，意识形态的力量不可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小视，知识分子如果想当然地以为属下能够自己发言，而不需要去为他们做事，实际上是逃避责任。

斯皮瓦克也指出了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的不足之处，认为他们在煞费苦心地还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属下阶级的主体意识。属下研究小组不辞辛苦地想替属下说话，但是结果也许会适得其反，实际上可能恰恰再次使他们丧失话语权。尤其重要的是，属下研究小组忽视了对女性的思考，女性视角的缺乏成为他们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弱点。

因此，在斯皮瓦克看来，无论是西方激进知识分子、印度的属下小组或是女性主义者，都不能帮助属下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反还可能会进一步剥夺他们的话语权。她以殉夫女子为例，指出这些女

子被印度教编码为想要跟丈夫一起赴死的“好妻子”，而被英国帝国主义者编码为“走向屠杀的牺牲品”，她们的身体成为两种意识形态争夺的场所，而在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遮蔽下，她们的声音无处可寻。

斯皮瓦克还对属下女性的另一个属下特征即身体上的差异性作了探讨。她非常赞赏法国女性主义对身体的重视，认为其主张的身体写作的目的在于彰显女性的差异。但是她反对法国女性主义不顾身体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而对身体的一统认识。她认为女性身体实际上反映出社会文化因素，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身体承载着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对她们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以印度女作家德维的小说为例，斯皮瓦克指出属下女性的身体与精英女性所描写的身体迥然不同。

斯皮瓦克致力于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第三世界女性现实之间的相关性。她一方面挖掘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异质性，找出西方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力图促进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她认为，虽然在第一世界精英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全世界的女性之间还是应该通过对话和沟通形成一个策略本质主义的集体来达到争取女性权利、改变女性屈从地位的目的。在斯皮瓦克看来，第一世界女性，尤其是知识分子女性，不能对属下女性的处境袖手旁观，也不能自以为是地代替她们说话从而进一步剥夺属下女性的话语权。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斯皮瓦克开始关注翻译与属下女性的文学再现问题的关系，并致力于翻译理论的研究。推动她转向翻译理论研究的动力，无疑与她对属下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翻译被斯皮瓦克看作是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之间沟通的桥梁。然而，在当前的欧洲语言霸权之下，把第一世界女性文本翻译到第三世界语言居多，而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翻译到第一世界中很少。而这种翻译往往不尊重源文本所承载的文化特殊性，反映出翻译中的暴力。斯皮瓦克重视翻译的政治，同时又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去政治化，提醒广大译者应尽力传达第三世界文本的修辞性，警惕翻译过程中的暴力。她重视传达第三世界文本中的文化，从而给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把翻译印度作家德维的政治小说作为彰

显第三世界属下女性差异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翻译、评论和介绍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帮助第一世界读者理解第三世界属下女性不一样的生活和处境。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是斯皮瓦克属下女性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斯皮瓦克非常重视教育在建立女性集体中的作用，把教育视为摆脱属下处境的最佳方案。她借鉴了保罗·弗莱雷的贫困人口教育方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指出单纯经济上的援助不足以使属下女性摆脱属下性，而要想使属下处境产生危机，教育应该是经济援助等方法的最好补充。教育者的责任就是要通过“非强制性地对受教育者的欲望进行重组”，让属下阶级进入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用通行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最终才能消除属下性。斯皮瓦克还主张应该通过教育使第一世界女性学会向属下学习，摆脱自己的西方中心论和对属下的偏见，真正做到尊重他者的伦理独特性，从而建立对属下有利的伦理关系。

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斯皮瓦克非常注重文学在女性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她认为应该用比较文学来培养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想象力，借鉴比较文学的文本细读和走向他者的方法，为走向对话和沟通创造条件。然而，学科的封闭和浓重的欧洲中心色彩使今天的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四伏。斯皮瓦克呼吁对比较文学进行彻底的改革，使之成为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属下女性之间沟通的有效工具。

总而言之，斯皮瓦克利用策略本质主义的方法，既注重彰显第三世界属下女性的异质性，又关注建立包括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女性集体，努力为女性争得政治上的权利。她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Abstract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stmodern feminist studies. Well-equipped with theories of deconstruction, Marxism, femi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she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campaigns for the rights of the gendered subaltern in the Third World.

One of her greatest contributions to postmodern feminism is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essentialism. The appropriation of postmodern theories has helped feminism gather momentum and evolve into a most dynamic and creative branch of theories in the postmodern era. However, the anti-essentialist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theories threatens to upset the cornerstones of feminism, and whether postmodern theories and feminism could be combined in postmodern feminism has been questioned. Postmodern feminism is in crisis. Spivak upholds strategic essentialism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of postmodern feminism. As an anti-essentialist, she admits that there is not a universal essence of all women, so the cultural, economic and other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But she argues that politically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make claims with the concept of ‘women’, which is a strategic use of essentialism. With strategic essentialism, postmodern feminism eventually gets out of the crisis.

Spivak scrutinizes International Feminisms represented by French Feminism and Anglo-American Feminism and warns people of their misfire in the Third World. She highly appreciates French Feminism's double program against sexism and for feminism and adopts its anti-essentialist stand. However, when she examines the theories of French Feminism represented by Hélène Cixous, Luce Irigaray and Julia Kristev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ace and class, she finds out that the solutions offered do not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Third World women. What's more, they have generalized the experience of First World women as universal to all women. Spivak strongly criticizes French Feminism and holds that it will not benefit but do harm to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for its ignorance of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women in race, class and culture. Spivak's next target is Anglo-American Feminism. She thinks highly of its efforts to reread female figures in literature and rewrite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by canonizing some women's writings, but determines that it is no more helpful for the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than French feminism for its complicity with imperialism. Anglo-American feminists objectify and represent Third World women as their "Other". Thus, for Spivak, the strik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of postmodern feminism is superficial, because they both foreclose Third World women and erase their heterogeneity.

According to Spivak, the key heterogeneity of gendered subaltern lies in their impossibility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Another disparity between the First World feminism and gendered subaltern's life l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s bodies. 'Écriture feminine' strives for showing the magnificence and mystery of female body, but this kind of body discourse is surely upset by the self-immolated bodies of sati and the tortured bodies of tribal women described in Mahaschweta Devi's works.

Spivak reaffirms the huge gap between international feminism and

the Third World practice with her studies of the unretrievable heterogeneity of gendered subaltern. However, she keeps looking for ways to bridge the gap and promo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women in different worlds.

Translation is held as the first bridge between women in different worlds by Spivak. As a translator, Spivak h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any feminist works of Devi about Indian subaltern women's sufferings. In order to help the First World women better understand the gendered subaltern described by Devi, Spivak attaches comments and introductions to her translations. As a theorist, Spivak advocates that a feminist translator should try hard to look for the agency of women in her translation and convey the rhetoricity of the original work. She warns the translators of the violence of translation and regards translation as a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women's unity.

For Spivak, education in both ends of the spectrum, i. e. , in the First World university class and the Third World poor schools, ensures close ties between women in different worlds. She holds that education is the best complimentary for financial help. Following Paulo Freire's theory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oppressed, Spivak maintains that education is the best means for the 'uncoercive rearrangement of the desires' of the gendered subaltern. For her, only through education could they be properly brought to the public sphere. And she argues that First World women should learn to learn from below and to be open and to respect the ethical singularity of the Other. As a schola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pivak recommen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the best medium of education for women of the two worlds. However, today'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is Eurocentric, narrow-minded and lack of vitality. Spivak calls for reform of this dying discipline, and suggests women should learn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and the way of going to the Other from the reform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o that they can build a kind of new ethical relationship responsible for

the subaltern.

In conclusion, Spivak explores the discontinuity of the First World feminist theories and the Third World reality by analyz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women from different racial, clas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Upholding strategic essentialism, she tries to promote the collectivity of women in the world to strive for their political rights. Her studies have broadened the horizon of postmodernism and provided insight for Chinese feminist studies.

Key words: strategic essentialism; gendered subaltern; heterogeneity;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ethical singularity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斯皮瓦克与当代理论	1
1.1 斯皮瓦克其人其著	1
1.2 斯皮瓦克的理论资源	4
1.3 斯皮瓦克理论的特点	18
1.4 国内外学者对斯皮瓦克的评价	22
第 2 章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29
2.1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困境	30
2.2 策略本质主义：一种出路	36
2.3 斯皮瓦克对策略本质主义的运用	40
2.4 对策略本质主义的评价	45
第 3 章 斯皮瓦克对西方精英女性主义的批评	51
3.1 对法国女性主义的批评	51
3.2 对英美女性主义的批评	64
3.3 通过批评和对话走向属下女性研究	76
第 4 章 属下女性的属下特征	80
4.1 何为属下？	80
4.2 属下女性能说话吗？	91

4.3 属下女性如何能写自己？	110
第5章 翻译理论与实践：属下女性的文学再现问题	119
5.1 斯皮瓦克翻译理论研究的背景	120
5.2 斯皮瓦克的翻译理论与属下女性再现	122
5.3 斯皮瓦克的翻译实践与属下女性再现	137
5.4 对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评价	140
第6章 与属下女性对话：“对不可能性的体验”	143
6.1 对不可能性的体验	143
6.2 教育与女性之间的对话	147
6.3 比较文学与女性集体的形成	158
6.4 建立对属下负责任的伦理关系	166
参考文献	174
后记	190